

《修辞学发凡》
与
中国修辞学



责任编辑：宗廷虎
封面装帧：范一辛

《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4千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9253·002 定价：2.15元



陈望道先生六十年代的照片



陈望道先生在书房里



1932年《修辞学发凡》
初版封面





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隆重举行

目 录

纪念陈望道先生及其《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

-吴文祺(1)
- 回忆望道先生.....倪海曙(9)
- 悲愤与怀念.....罗竹风(27)
- 《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张志公(34)
- 望道先生纪念.....张寿康(38)
- 学习《修辞学发凡》，发展《修辞学发凡》.....乐嗣炳(47)
- 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的繁荣贡献
力量.....胡裕树(53)

学习望道先生，为建立中国化的语言学理论体系而

- 努力.....李振麟(64)
- 学习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精神.....张 斌(67)
- 读《修辞学发凡》的两点体会.....濮之珍(69)

- 马克思恩格斯和修辞学.....宋振华(77)
- 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胡裕树 宗廷虎(90)
- 修辞学和辩证法.....王希杰(104)
- 以变化发展的观点进行修辞研究.....邓明以(123)

——学习《修辞学发凡》的体会

辩证法的修辞观……………陈光磊(136)

——学习陈望道先生修辞学思想札记

修辞三论……………高天如(144)

重读望道先生《在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许宝华(153)

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濮侃(161)

《修辞学发凡》的历史功绩……………李嘉耀(166)

为了前进的纪念……………王兴林(179)

——谈《修辞学发凡》的科学性、准确性、典范性

继承与创造的楷模……………杜高印(187)

论《修辞学发凡》的创新……………李金苓(206)

修辞要讲究题旨情境……………范晓(225)

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王德春(239)

略说“辞面”与“辞里”的离合……………刘焕辉(247)

——学习《修辞学发凡》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科学论述

试论“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基础……………张德明(256)

明确对象，加强消极修辞的研究……………郑文贞(275)

语辞魅力初论……………胡奇光(283)

试谈辞格的特点……………袁晖(304)

论通感……………秦旭卿(315)

——兼论修辞的心理基础

论图示格……………阮显忠(334)

修辞与篇章结构……………戴磊(349)

——读《修辞学发凡》得到的启示

学习《修辞学发凡》，探讨篇章修辞……………倪祥和(353)
试论模糊语言……………徐丹晖(364)

修辞学和语用学……………戚雨村(377)

修辞学是言语学……………郑远汉(385)

探索修辞的美……………宗廷虎(395)

——《修辞学发凡》与美学

《修辞学发凡》与修辞教学……………彭嘉强(411)

英美语体学研究中的—些问题……………程雨氏(418)

论语体……………乐秀拔(425)

《修辞学发凡》与语言风格论……………李熙宗(433)

关于发展汉语计算风格学的献议……………钱 锋 陈光磊(444)

在《修辞学发凡》的《结语》激励下前进……………吴士文(452)

——读“发”光而超“凡”的《结语》

“接过望道先生的接力棒”……………东 木(462)

——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纪要

纪念陈望道先生及其《修辞学发凡》 出版五十周年

—— 吴 文 祺 ——

陈望道先生在思想战线上是一位革命的战士，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创新的先驱。

在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专制。陈先生刚从日本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师兼级任（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他首先响应《新青年》的号召，改用白话文作教材，当时还没有现成的白话文教科书，他从报章杂志上选取思想进步的作品来教学生，学生如“拨云雾而见天日”，在浙江立刻燃起了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熊熊烈火。同时，他班上的学生施存统（后来改名施复亮）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发表在杭州出版的《教育新潮》上，被浙江的反动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立即下令撤职查办校长及级任教师，开除参加运动的学生，并派军警包围了学校。由于全市学生的坚决斗争，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使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不能得逞。但是陈先生和其他三

位赞成白话文的语文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当时学生称他们为四大金刚）终于被迫离开了学校。

陈先生离开一师以后，回到家乡义乌，就从事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译本。这个译本在全国各大城市广泛流传，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武汉长江书店曾翻印了十多万册，由总政治部购买了分送给北伐军的战士和政工人员。这本书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陈先生不但很早提倡白话文，而且还很早提倡书刊横排及采用标点符号，当时连《新青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曾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希望他们实行“横行与标点”^①。他说：“譬如文字当横行，这已有实验心理学明明白白的昭告我们，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明其妙。……诸子既以革新为帜，我很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②。

他又是较早的提倡拼音文字者之一。他认为拼音文字“乃是三百年至少一百年语文教育经验和现实需要结合的一种伟大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创举。有了这种文字以后，把它注在汉文旁边，就能使不认识汉字的人也能把汉字声音准确读出，把它单独使用，又能使读的人立刻晓得写的人所要说的字音，假使说的字音还是读的人听起来有意思的说话，便连意思也完全可以懂得，和懂汉文的人读汉文一样，而学这些字母，无论那一种都只要几个星期就可以学熟，对于语文教育的普及，功效极其快，极其大”^③。

他不但热心宣传拼音文字，而且自己还煞费苦心制订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④，这个拼音表对解放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正因为陈先生在思想战线上是一位革命的战士，所以在学术研究上才能打破陈规，开辟新途，成为一位革新的先驱。他关于语文学方面的著作很多，现在只谈一谈他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

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期，钻研了日本三大修辞学家坪内逍遙、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嵐力的书。那时他就决定了以建立中国的科学的修辞学为他的努力方向。他在学术研究上，既反对盲目摹仿外国，生搬硬套；又反对墨守传统旧说，不敢创新。他主张“我们应当尽量搜集实际的材料，根据实际的材料来找寻修辞的条理，不当影印陈说，来作新书的内容。故于修辞的诸论著，无论是中的外的古的今的，都只能备作我们的参考，备作我们要解说某一现象而不能即得确当的解说时的提示，或作我们解决方式的佐证。而自己却应当切实负责地寻求各种眼见耳闻的修辞事实，来逐一加以观察分析”^⑤。

《发凡》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确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华侨修辞学家郑子瑜对此书曾作了如下的评价：“真正不顾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东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⑥。

中国古代并非不注意修辞，但是论及修辞的文章或书籍，大都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诚如陈先生所说：“古来留传给我们的诗话，文谈，随笔，杂记、史论、经解之类，偶然涉及修辞的，又多不是有意识地在作修辞论，它们说述的范围，照

例是飘忽不定；每每偶尔涉及，忽然又颛开了。我们假使限定围去看，往往会觉得所得不多”⑦。

自从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以后，有些人就从故纸堆里搬出那些修辞古说来附会文法，陈先生称这个时期为“修辞文法混淆时期”⑧。

他举刘金第的《文法会通》为例。据我所知，1904年广智书局出版的龙志泽（伯纯）编的《文字发凡》，比刘金第的《文法会通》早四年。此书分四卷，卷一正字学是叙述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的概要的，卷二，词性学，大致沿袭《马氏文通》而稍加简化，卷三、卷四修辞学，篇幅较多，占全书的四分之二。名为修辞学，卷三开头一部分讲“句读”，即《马氏文通》的《论句读》的摘要，卷四《文法图说》《体制》《辨品》《评论古文》诸节，严格说，都不属于修辞学的范围。只有卷三《修辞现象》一章（共二十四张，四十八面），才可算是研究修辞的。这一章的前面，列了一个表，照录如下：

修辞现象 (词藻)	外形上 (语彩)	消极的 (言语之妥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语句之纯正 语句之精确
		积极的 (言语之表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语趣 语调 语势的 形式的
	内容上 (想彩)	消极的 (命题之完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命题之完备 叙次之顺正
		积极的 (想念之发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想念之增殖——譬喻法 想念之变形——化成法 想念之排列——布置法 想念之态度——表出法

此书《例言》第十条说：“全书编辑，共采用书籍五十余种，亦间有采东西文者，故间有东西学术之字，每欲改易其名，然恐失真，故仍其旧，阅者幸勿指为不伦”^⑨。这里所谓“中西学术之字”就是指本书所用的术语。这些术语是从日本人修辞学书中搬过来的。

此书关于文法部分，显然沿袭《马氏文通》之旧。《文通》于1898年初版，线装本十册，今已罕见，1904年再版，平装本上下两册，均商务印书馆发行。提到《马氏文通》，我想插一段题外的话。195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章锡琛的《马氏文通校注》有两处错误：（1）“校注例言”：一、本书依据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本排印，添加标点符号”。按1904年本是商务印书馆再版排印本，此处误作初版本。（2）《马氏文通·例言》末了一条说：“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俱以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校注者按：此系木刻本版式。商务铅印本，书句改为小字双行夹排书名，篇名旁无线。）”按1898年商务初版本《马氏文通》也是铅字排印，非木刻本。只有扉页三行大字“光绪二十四年孟冬”，“马氏文通”，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翻刻必究”是木刻。另外我曾上海旧书店见到一部木刻本《马氏文通》，起初以为这是最初刻本，仔细一看，才知道是绍兴府中学堂根据商务1904年的平装本翻刻的。1898年初版本引书小字居中，所引书名篇名之旁加标单线，和《马氏文通例言》完全符合。章锡琛未见初版本，他的按语错了。

话又说回来，五四以后，是修辞学成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时期，陈先生称为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⑩。这一时期，国内有了专讲修辞的书。这类书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从外国的

同类书中移植过来，把中国例子按式填进去，如唐钺的《修辞格》就是。此书于1923年1月由商务出版，主要是根据 J.C. Nesfield, *Senior Course of English Compsifion*(1910年), J.C. Ferneld, *Expressive English* (1918年) 两书，并不是从汉语的大量资料中归纳出来的，难免生搬硬套之病。另一种是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其《导言》说：“近世外慕风炽，举海外修辞之术，绳诸前文，得其形似，乐为比附，彼所未及，此亦阙如。今思述先士之正论，考前文之成规，范为修辞之学，先陈研究之法”^①。可见该书作者既反对借鉴外来的学说，又不注意修辞现象是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事实。只是墨守古人陈言，来统括汉语的一切修辞现象，无形中带有复古的倾向。其实盲目模仿古人和盲目模仿外国，可说是半斤五两，都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陈先生的研究修辞学却不是这样。他既不忽视民族的传统，也不排斥外来的新说。他说：“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②。这段话说得好，很可以看出他研究修辞学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至于陈先生之著《修辞学发凡》，经过十余年的勤求探讨而成，刘大白的《修辞学发凡序》已有详细的介绍，我再补充一些具体的例子，以作刘说的佐证。

陈先生对于中国所独具的几种辞格如回文、析字、藏词、对偶等，他都反复研究，“综合贯通以类其同，分析比较以观其异，”经过无数次的修改，然后写定，如他对于“析字格”的论述，无论是属于修辞诸现象的原料，或是属于关涉修辞的诸现象的副料，徵引古今各种书籍数十种之多，在这样丰富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精密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所以这部书是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又如“对偶格”，不难于举例，而难在和其他相近辞格的互相牵涉，不易划清界线。陈先生不但把这一格所以独立的道理说清楚，而且从理论上说明对偶在美学上的价值。他说：

“对偶这一格，从它的形式方面看来，原来也可说是一种句调上的反复，故也有人将它并入反复格；而从它的内容看来，又贵用相反的两件事物互相映衬。如刘勰所谓‘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文心雕龙·俪辞》），故又有人将它并入映衬格。但对偶所以成立，在形式方面实是普通美学上的所谓对称，而内容方面也非全然由于映衬的句法构成，无论把它并入反复或并入映衬都觉得不很合适，因此，现在仍旧让它独立了^⑧。

同时他也注意到滥用对偶的流弊，他说：“这种辞格曾经有过畸形的发达的时期，……使人觉得极其不自然。因此当时文化学术界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的时候，曾经对于这种现象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当时有些人反对对偶，也有人认为对偶不对偶应当任其自然”^⑨。我曾经拿《发凡》的1932年、1962年、1976年三个不同版本来比勘一下，这段说明，经过了三次修改。这也反映了陈先生治学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此外，《发凡》引证肖淑兰的《菩萨蛮》词，当时未注出处。后来陈先生化了很多时间，查阅各种有关的资料，从臧懋循的《元曲选》中，找到了贾仲名的《肖淑兰情寄菩萨蛮》杂剧中引此词，但词中没有“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的话，因此不能作为以定数代不定数的辞格的例子，只得弃而不用。后来终于在清徐钺的《词苑丛谈》里找到了这首词，他在1976年《发凡》重版时，于引文之后加注了出处。

又如刘大白的序中谈到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时，把元代

误作明代，把书名误作《助语辞》。因为刘氏未见元代的刻本，他根据的是明清两代的翻刻本。明人刻书，往往任意改动书名，如冯梦祯刊刘肃《大唐新语》改为《唐世说》，郎金奎刊刘熙《释名》改作《逸雅》。故明人把卢以纬的《语助》改作《助语词》是当时刻书的通病，清代刊本又沿袭明刊之误。陈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中，发现了此书的元代刊本。他于1962年去北京开会时，抽时间专门到该馆查阅此书，并托该馆用缩微胶卷影印了一份。为了改正这个错误，他在1962年版《发凡》的刘序末尾，加上了一个六百多字的“附注”。

我以上的话，只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舔皮论骨，凿孔裁须，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指正。

附注：

①②③④ 《陈望道语文论集》第5、412、283—28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⑤ 《修辞学发凡》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下同。

⑥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之变迁》，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1965年3月1日初版。

⑦⑧⑨ 《发凡》第249、250、252页。

⑩ 《文字发凡·例言》二页下，1904年广智书局印行。

⑪ 《发凡》第253页引郑莫《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原文。

⑫ 《发凡》第255页。

⑬⑭ 《发凡》第179—180页。